

【多元觀點】

從四個方面略談「東亞儒學」的必要性⁺

吳震^{*}



日本思想史研究專家子安宣邦基於其自身的東亞問題的批判與反省，對二十一世紀臺灣東亞儒學研究進行了批評，強調當今的「東亞論述」（包括東亞儒學）應努力克服「中華文化一元論」之傾向，並極力主張應由「實體的東亞轉向方法的東亞」。誠如子安所言，這種實體化的東亞「絕不是一個多元的世界」，倒是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帝國日本企圖建立實體化的以日本為盟主的東亞世界的東亞論有幾分相近。為了不讓帝國日本「亡靈一般的言說」死灰復燃，有必要將這種實體性的「東亞」觀念徹底解構。子安的這種批判精神無疑十分難得也令人同情。然須指出，子安批評臺灣儒學研究有可能是要重現「帝國」的東亞論述不免有杞人憂天之嫌，但他批評臺灣學者的東亞論述缺乏歷史性批判卻未必是無的放矢，

另一方面，作為日本學者，他對東亞問題的反省批判十分重要，但是中國學者（包括臺灣學者）在探討東亞儒學問題時，有關近代日本的東亞論述批判並不應當是東亞儒學這一問題設定的學理前提。

黃俊傑以其自身長年涉足東亞儒學研究的經驗，對東亞儒學如何可能這一重要問題作出了積極的回應，以為東亞儒學首先是一空間概念，意指儒學思想及其價值理念在東亞地區的發展及其內涵，其次，東亞儒學又是一時間概念，意指儒學在東亞各國儒者的思想互動之中應時而變，而非抽離於各國儒學傳統之上的一套僵硬不變的意識形態，因此東亞儒學是一多元性的學術領域，其中並不存在前近代式的「一元論」預設。應當說，有關東亞儒學的這

⁺ 本文係二〇一〇年八月四日本院儒學討論會內容。

^{*}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一論述大致是不錯的。然而重要的是：不僅反省東亞論述的歷史乃是東亞儒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前提，同時，東亞儒學研究也必將反過來推動我們對東亞問題作出反思，由此，東亞儒學研究具有批判和建構的雙重意義。就此而言，二十一世紀臺灣東亞儒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這是毋庸置疑的。

通過上述回顧，筆者指出東亞儒學無非是指儒學在東亞，這是一種歷史現象學的描述，故東亞儒學又是一個社會－文化概念。然而，我們既可從「東亞」思考「儒學」，也可從「儒學」思考「東亞」，因為「東亞」已然是一複合型的文化地理概念。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有必要從「文化東亞」這一概念出發，或可對東亞儒學何以可能之問題作出有意義的回應。最後筆者提出還有必要深入思考東亞儒學何以必要這一問題，並提出四點初步看法：1. 東亞儒學作為一種跨文化研究，對於中國自身的儒學傳統的再認識、再評價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因為如果缺乏一種「他者」的眼光，倒有可能助長一種「自我中心論」的情緒，而不能冷靜看待中國儒學在東亞的區域文化中被挑戰的可能性；2. 東亞儒學研究對於我們客觀地瞭解文化東亞的歷史特質、把握文化東亞的多元形態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與此同時，在對歷史上帝國主義論述的東亞觀（包括中華帝國、日本帝國時期）進行歷史批判的意義上，東亞儒學研究也是完全有必要的；3. 如所周知，近現代東亞中、日、韓三國的歷史進程充滿曲折，至今仍有諸多令人不快的因素未能消除，有時甚至有一些意識形態的乃至情緒化因素滲入或干擾學術研究，因此，東亞儒學研究視野的確立不惟對於我們深入瞭解及反省近現代東亞的政治－文化歷史、社會－文化歷史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而且對於我們將來重構東亞文化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4. 在當今「全球化」（globalization）時代，各種文化傳統正

在積極展開對話並加快互相溝通，共同構成全球化的組成部分，正是在此意義上，東亞儒學研究完全可以為儒學走向世界、參與文明對話提供重要的契機，並能使東亞儒學為應對全球化問題提供一些有益的思想資源。